

杨海萍 主编

良崙名师讲坛
演讲录

(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三年·北京

目 录

- 冯其庸 我的《红楼梦》研究 3
- 谭 帆 中国古典小说漫谈 17
- 王一丹 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
——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 37
- 戴庆厦 立足“本土”，讲究“视野”
——漫谈当今语言研究之路 53
- 齐东方 交流的价值
——外来器物与中国文化 65
- 尚 刚 苍狼白鹿元青花 77
- 〔伊朗〕M. B. 乌苏吉 波斯文献中关于喀什噶尔
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的记载 95
- 咎 涛 “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 109

邓正来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139
杨圣敏	民族学是什么	157
纳日碧力戈	民族共生与民族团结 ——指号学新说	187
庄孔韶	从组织文化到作为文化的组织	197
葛剑平	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211
顾钰民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229
顾明远	我的教育生涯	249
蒙曼	鉴古知今 ——武则天的领导艺术	265
于丹	阅读经典 感悟成长	279

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

——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

王一丹

一、从胡适的一首译诗说起

1919年4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第6卷第4号，刊发了胡适（1891—1962）翻译的一首波斯四行诗。该诗转译自19世纪英国诗人、翻译家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英译本《鲁拜集》（Rubaiyat），即著名波斯古典诗人海亚姆（Omar Khayyam, 1048—1123）的四行诗集。《鲁拜集》中各诗原本没有标题，胡适翻译此诗后，题名为《希望》，并写了题记。此诗后来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但题记被删，汉译后所附的非兹杰拉德的英文翻译也有所改动。胡适翻译这首《希望》，让中国读者首次接触到海亚姆及其作品。译诗的题记简短而明了，准确地介绍了海亚姆的成就以及“鲁拜”（rubā‘i）^①这种波斯传统诗歌的主要特点。下面是《希望》一诗及其题记：

希望 胡适 译

这首小诗的原著者 Omar Khayyam 乃是波斯国人。他的数学和天文学是波斯文明史上的一种光荣。他不但是一个科学家，

^① 胡适称之为“绝句”，另有“柔巴依”、“怒湃”、“四行诗”等多种译名，本文按多数人习惯，称之为鲁拜。

还是一个诗人。他有五百首“绝句”（原名 Rubaiyat，乃是四句体的诗，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没有韵，狠（很）像中国的绝句体，故借用此名），狠（很）有名的。英国诗人 Fitzgerald 译出了一百多首，此外还有他种译本。这一首是 Fitzgerald 译的第 108 首。

这位波斯诗人生年已不可考，他死在西历 1123 年，当中国宋徽宗宣和五年。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Omar Khayyam^①

诗中洋溢着一种打破束缚、大胆解放和创造的激情与勇气。胡适翻译这首《希望》之时，正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时的胡适，作为白话诗最早的积极倡导者，扛着“文学革命”的大旗，正大力主张并亲身实践着白话诗的创作。他出版于 1920 年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在《尝试集·自序》中，胡适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主张，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②。这种打破旧秩序、开创新天地的精神在新

^① 原载《新青年》第 6 卷第 4 号，1919 年 4 月 15 日，第 374 页；收入《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版，第 48 页。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 39 页，见《尝试集（附去国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版。

诗创立期影响极大，这也正是《希望》这首译诗的精神。

菲兹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内容大多是对韶光易逝、人生无常的慨叹，其基调是“清新的东方情调和一种但求今世欢乐的思想”^①，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浪漫的风格”^②，表达了“醇酒妇人的享乐主义”和“‘宇宙为万物之逆旅，人生乃百代之过客’那种永恒的悲哀”，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迷惘怀疑”情绪^③。只有被胡适选中的这一首，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充满了一种打破旧世界、开创新天地的豪迈。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抄引一首胡适填写的《沁园春·誓诗》，与《希望》两相比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④

好一个“制天而用之”，“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如此非凡的气魄，与《希望》一诗何其相似。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正如它们各自的题名那样，《誓诗》表达的是一种誓言，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的决心与誓言；《希望》则表达了一种愿望，打破传统、开天辟地的愿望。《誓诗》作于1916年，《希望》译于1919年，同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映的同是一种激扬反抗、自由创造的时代精神。

胡适翻译的这首《希望》，据说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译诗，也是在他诗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⑤。这首诗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不少诗人、评论家都曾发表看法，褒贬得失，并就诗歌翻译的问题进

①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9页。

② [英]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蔡文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③ 梁实秋：《英国文学史》（第三卷），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公司1985年版，第1585—1586页。

④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27页；又收入《去国集》，第50页，见《尝试集（附去国集）》。

⑤ 徐志摩：《蕞默的一首诗》，载《晨报副刊》1924年11月7日，收入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徐志摩全集》第四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行了讨论。闻一多（1899—1946）说：“胡译虽过于自由，毫未依傍原文，然而精神尚在。”^①成仿吾（1897—1984）则说：“一多说胡适之的《希望》精神尚在，我却不以为然。胡译不仅与原文相左，而且把莪默的一贯的情调，用‘炸弹！炸弹！炸弹！干！干！干！’一派把莪默的一贯的情调，用‘炸弹！炸弹！炸弹！干！干！干！’一派的口气，炸得粉碎了。”^②徐志摩也认为胡适的这首诗“不能叫译”，他说：“适之那首莪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莪默。”^③显然，胡适的汉译，也像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一样，被认为不忠于原作；同时，它也像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一样，传达着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信息，因而激起了时人的共鸣。正如当时一位读者所说，“我们中国现在的青年，哪个读了能不受感动？”^④

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第二版有110首四行诗^⑤，胡适唯独选译了这一首，并非偶然。在1928年9月10日发行的《新月》第1卷第7号上，我们读到了胡适翻译的哦亨利（今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戒酒》，小说结尾处引用了欧玛尔·海亚姆的两首四行诗，其中最后一首即这首《希望》，不过没有标题，译文有两处不同，一是诗句以5行的形式出现，二是第2行的“糊涂世界”改作“糟糕世界”。据胡适的附记，此篇小说译自“美国短篇小说大家博德（William Sydney Porter），笔名‘哦亨利’（O. Henry）……他短篇全集凡十二册，此篇原名为 *The Rubaiyat of a Scotch Highball*，载在全集中的 *The*

① 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原载《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5月1日，“评论”第14页；收入孙党伯、袁睿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② 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评论”第24页；《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08页。

③ 徐志摩：《一个译诗问题》，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28期，1925年8月29日；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304页。

④ 天心：《我也来凑个趣儿》，《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2日第四版。

⑤ 胡适在题记中说此诗译自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的第108首，可知是译自英译本第2版，因为只有第2版收录了110首四行诗，其他的版本只收75首（第1版）或101首（第3、4、5版）。不过胡适此处所附的英文翻译与菲兹杰拉德第2版的文字略有出入，如所引第一行中的第8词“Him”，在菲兹杰拉德的第2版中为“Fate”，菲氏是在第3版以后才改用“Him”一词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对比：*Rubaiyat of Omar Khayyám*, rendered into English verse by Edward Fitzgerald, the four editions with the original prefaces and notes,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910, p. 102, no. CVIII (second edition); p. 159, no. XCIX (third edition); p. 217, no. XCIX.

Trimmed Lamp 一册内。哦亨利最爱用一地的土话，和一时的习语。土话是跟着地方变的，习语是跟着时代变的，时变境迁，便难懂得。字典又多不载这种土话熟语。故外国人读他的作品往往感觉很大的困难。我译此篇的志愿，起于1919年2月，只译了其中的莪默的第二首诗，后收在《尝试集》中，题为希望。一搁笔便直到今日，十年的心愿于今方了，总算一件快心的事。”^① 如此看来，胡适译此诗的起因，是欧·亨利的小说，诗歌很快译出，小说却迟至9年后才译成，这固然是因为小说难懂——如胡适所言，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首诗更强烈地打动了译者的心。小说中引用的另一首鲁拜诗，就没有得到胡适同样的喜爱，因为它是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及时畅饮的酒诗，虽然优美，却不符合译者当时的精神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翻译的《希望》一诗，并不只以上两种版本，另外还有第三种未曾刊发、鲜为人知的译文。2012年5月5—9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14周年北大著名学者手稿展”上，展出了胡适的5件手稿，其中一件为“胡适译古波斯诗人莪默《鲁拜集》诗一首”（彩图1），^② 译文如下：

爱呵！要是天公能让你和我
抓住了这糟糕的世界，
我们可不要把他全打破，
好依着我们的心愿重新造过么？

这个译稿与发表于《新青年》和《新月》上的两种译文区别较大，尤其是第一行的起始句“爱呵！”在胡适已发表的版本中是没有

^① 哦亨利著：《戒酒》，适之译，《新月》第1卷第7号，1928年9月10日，第9页。这两首鲁拜收入《尝试后集》，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小说男女主人公都对《鲁拜集》情有独钟，经常一起念诵其中的诗句。小说篇名今译《苏格兰威士忌的〈鲁拜集〉》，收入《剪亮的灯盏》，参见〔美〕欧·亨利著《欧·亨利小说全集》第四卷，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17页。

^② 承朱玉麒教授惠赐其在手稿展上专门拍摄的照片，谨此致谢。

的；第三行的翻译，也改掉了“再团再炼再调和”那种旧体诗的味的道^①，而采用了更舒缓的、接近口语的白话。在手稿上还清晰可辨译者所做的修改，其中，原写作“寒伧了”的三字被删去，改作“糟糕”；“全打破”前原本有“一齐都”三字，后被圈划删除；最后一行所做的改动最大，原译是“再依着我们称心如意地把他重新改造过么？”译者删减掉了过多的赘词。从胡适对手稿的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首诗的翻译相当慎重认真，经过了反复推敲，一译再译。由于手稿未注明完成日期，无法得知它与已发表的两种译稿孰前孰后^②。

比较三种译文，未出版的这一稿从“忠实性”角度来看似更接近菲兹杰拉德的英译，但诗歌内在的节奏感却不如《新青年》版，尤其是在用韵上，《新青年》版“我、破、和、过”四个韵脚连用，自然而有力，一气呵成，比第三种译稿更富于感染力。

《希望》一诗虽短，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以清新自然的白话，激情洋溢的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注目，在此之后，才出现了郭沫若的全译本《鲁拜集》，从而进一步吸引了时人的关注，并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次关于诗歌翻译的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扩大了海亚姆及《鲁拜集》的影响，也推动了汉语诗歌翻译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小诗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二、郭沫若与《鲁拜集》全译本

在胡适首开纪录、翻译了《希望》这首四行诗以后，郭沫若（1892—1978）于1922年9月完成了对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第4版全部

^① “再团再炼再调和”似是自那首著名的《我依词》化来，“有赵松雪合管夫人‘塑泥人’的小词的意味”（荷东：《译莪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3日第四版）。

^② 本文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刊出之后，读者顾家华来信告知：北大图书馆邹新明先生曾撰专文介绍此译稿，并指出翻译时间“应该在胡适题名为《希望》的翻译之后”，即“1924年11、12月间”。参见邹新明《胡适翻译莪默〈鲁拜集〉一首四行诗的新发现》，《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3期。笔者在此谨向顾家华先生特致谢忱。

101首鲁拜的汉译，并撰写了一篇长文《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加以介绍，文章与翻译一并刊发于1923年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①。其中第99首与胡适的《希望》为同一首。在文章的第一节“读 Rubaiyat 后之感想”中，郭沫若说，《鲁拜集》使他联想到了屈原的《天问》对宇宙人生的疑问，联想到了歌德的《浮士德》和我国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享乐主义，并认为从海亚姆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我国诗人刘伶和李太白的面孔来^②。

郭沫若的翻译引起了更多人对海亚姆的兴趣。闻一多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1号（1923年5月）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莪默伽亚谟之绝句》，表示“我读到郭译的莪默，如闻空谷之跫音”^③，认为郭译的成功之处在于“译者把捉住了它的精神，很得法地淘汰了一些赘累的修词，而出之以十分醒豁的文字，铿锵的音乐。”^④对于郭译各诗中的失误，他逐一举例指出并订正，还同时刊出了他自己的几首翻译。此后不久（1924年11月7日），诗人徐志摩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短文《莪默的一首诗》，针对胡适翻译的《希望》提出看法，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重译，与胡适的译文一起刊出，以期抛砖引玉，“供给爱译诗的朋友们一点子消遣；如其这砖抛了出去，竟能引出真的玉来，那就更有兴致。”^⑤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及译诗，吸引了一个名为“天心”的读者的注意，他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也来凑个趣儿》一文，附上自己的译诗，并写道：“我因看见胡适之、郭沫若、徐志摩关于莪默的一首小诗闹得如此有趣，所以也忍不住要来凑个趣儿。怪不得适之先要用寸楷来写，高声用徽州调来唱这首诗的，它本来是很好呢；尤其是我们中国现在的青年，哪个读了能

① 郭沫若：《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创造季刊》第1卷第3号，“杂录”第1—41页。

② 同上书，“杂录”第1—11页。

③ 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评论”第10页；《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95页。

④ 同上书，“评论”第17页；《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01—102页。

⑤ 徐志摩：《莪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7日；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241页。

不受感动?”^①此文刊发的第二天，一位“荷东”读者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议论，认为胡适是意译，徐志摩是直译，都有可改进之处，因此他分别用白话与文言两种风格尝试进行翻译，“以凭胡徐二先生鉴定。”^②

这一连串的反响，不只令人感到“如此有趣”，还令今人看到了当时文坛的活泼健康、开放自由的批评氛围。鉴于这几人的译作是继胡适《希望》之后最早的鲁拜汉译，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见其全貌，我们在此将其逐一转录。至于这些译文以及后来的各种《鲁拜集》汉译孰优孰劣，非本文主旨所在，这里不作比较，读者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看法。

郭沫若：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反畔“他”时，

把这不幸的全部的“计划书”来夺取，

我怕不把它扯成粉碎——

从新又照我心愿涂写！^③

闻一多：

爱哟！你我若能和“他”钩通好了，

将这全体不幸的世界攫到，

我们怕不要搞得他碎片纷纷，

好依着你我的心愿去再抐再造！^④

徐志摩：

爱阿！假如你我能勾着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① 天心：《我也来凑个趣儿》。

② 荷东：《译我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3日第四版；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242—243页。

③ 郭沫若：《波斯诗人我默伽亚谟》，《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杂录”第40页。

④ 闻一多：《我默伽亚谟之绝句》，《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评论”第14页；《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99页。

再来按我们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①

天心：

爱呵！你我若能与上帝勾通，
把这个糊涂世界整个抓在掌中，
我们怕不一拳捶它粉碎，
依着你我的心怀，再造成整块？^②

荷东：

白话体——

爱呵！你我果能与运神合商（或叶韵改合作）
来执掌这支配万物的权，
我们岂不能将世界都打碎（或叶韵改打破）
改造成合我们心意的一种变迁？

文言体——

噫气长吁叹
爱神汝来前；
果能参造化，
执此万类权，
摧枯如碎粉
新观逐物迁，
一一随意旨
诤不心豁然？^③

以上的翻译，有白话体，也有文言律体，不见得都很理想，但

^① 徐志摩：《我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7日；收入《集外译诗集》，见《徐志摩全集》第一卷，第521页；第四卷，第242页。

^② 天心：《我也来凑个趣儿》。

^③ 荷东：《译我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3日第四版。又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243页，所录诗句略有出入，如“与运神”录作“兴运神”，“参造化”录作“感造化”，“一一”录作“一二”。

是，几位诗人和读者的热情参与、尝试、互相切磋与讨论，却为后来翻译的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①。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闻一多对郭译的批评，以及郭沫若的回应。闻一多对郭译《鲁拜集》评价很高，但是对于他的失误，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认为他的翻译有时是“明珠艳卉”，有时却是“马勃牛溲”，有时忠实到笨拙的地步，有时却又“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全篇还有一个通病，便是文言白话硬凑在一块，然而终究油是油，水是水总混合不拢”^②。面对这些批评，郭沫若未作任何辩驳，而是全盘接受，并表示：“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我自己也是不十分相信的地方，有些地方更完全是我错了。你说 Fitzgerald 的英译前后修改了四遍，望我至少当有再译三译。你这恳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加以改正。”^③ 回顾这一段往事，令人由衷地感到欣慰，为批评者的直言无忌，也为被批评者的虚怀若谷，同时，也令人更深怀念那个造就了如此文坛佳话的、已经远去了的时代。

在此后出版的《鲁拜集》单行本中，这首译诗经过了修改，形成了今天通常所见的这个译文：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抟拟！^④

^① 《希望》一诗可以说是译成汉语次数最多的英语诗歌之一，据说先后共有 26 个出自不同译者的版本。参见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5—157 页。

^② 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创造季刊》第 2 卷第 1 号，“评论”第 18 页；《闻一多全集》第 2 卷，第 103 页。

^③ 同上书，“评论”第 24 页；《闻一多全集》第 2 卷，第 109 页。

^④ 莪默伽亚谟：《鲁拜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01 页。郭沫若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些微差异，如上海光华书局 1930 年版中，第三行的“不会把”改为“不把”，第四行则删去了“我们”二字（第 74 页）。

在这个译文中，译者不仅遵从闻一多等人的意见改正了第一行中的失误，把“反畔”改为“串通”，同时对后三行也做了不小改动。只是，修改后的译文中“物汇规模”一词晦涩难懂，破坏了全诗语言的清澈和流畅，与郭译其他各诗相比，实非上乘之作。

郭沫若翻译的这 101 首诗，于 1924 年 1 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名《鲁拜集》。《鲁拜集》与郭沫若创作的诗集《女神》（1921 年）一样，都是“五四”精神所激发的产物。郭沫若本人谈到当年惠特曼《草叶集》对他的影响，“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②这里说的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缘由，也同样适用于他翻译《鲁拜集》时的情况。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诗歌，不论是创作还是译作，大都回荡着高昂的激情和雄壮的旋律，反映了一种突破一切束缚的彻底的叛逆精神和热望新生的浪漫主义激情。在稍后发表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中，作者继续呼唤着“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号召“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③，与上引鲁拜译诗中“和盘攫取、捣成粉碎”非常接近。《对话》最后的短诗中，第一句就是：“人们哟！醒！醒！醒！”使人很自然联想到郭译《鲁拜集》第一首第一句：“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④两者风格颇为相似。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充满了对革命未来的憧憬，其中洋溢着高亢的反抗和破坏的激情，与译自海亚姆的那首诗也是相通的。

^① 郭沫若：《涛声集·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8 页。

^②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3 页。

^③ 郭沫若：《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孤军》杂志第一卷第 4、5 期合刊，1923 年 1 月 1 日“打倒军阀”专号；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 卷，第 314 页。

^④ 我默伽亚谟：《鲁拜集》，郭沫若译，第 3 页。

三、《鲁拜集》初期汉译成功的启示

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之后的20多年里一共出版了4种版本，至少重印了8次以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事实上，郭译《鲁拜集》出版后，很快就有多人加入到《鲁拜集》翻译队伍中来，据新近出版的一本研究专著所列的《鲁拜集》主要译本简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郭沫若之后翻译出版过《鲁拜集》的译者有10人，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台湾出版的《鲁拜集》译本有8种之多，内地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断涌现新译本，除了转译自英语的译本以外，还有了直接译自波斯语的三种译本^②。这个简表并不完全，至少还可增加两种最近译自英语的译本^③，以及另外两种直接译自波斯语的译本，其中一种为英—法—汉—阿拉伯—波斯5语对照版^④，另一种为波—英—法—俄—阿—西（班牙）—汉—日8语对照版^⑤，均出版于德黑兰。

《鲁拜集》汉译者中，有大名鼎鼎的诗人^⑥，有著作等身的文学

①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1页。

② 参见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第84—85页。

③ [波斯]海亚姆：《鲁拜集新译》，覃学岚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年版；《陌上蔷薇：鲁拜集新译》，滕学钦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外，承顾家华来信告知，新近译自英文本《鲁拜集》的汉译本还有：《我默绝句集》（绝句体），陆谦（伯昏子）译，载于《由桥斋吟稿》，巴蜀书社2011年版；《鲁拜集》（绝句等混合体），阮小晨译，载于《英美名诗二百首新译》，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鲁拜集》（五言绝句体），徐燮均译，载于《英语名诗80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鲁拜集——世界上最美的诗歌》（绝句等混合体），王虹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④ Omar Khayyam, *Omar Khayyam's Quatrains*, English-French-Chinese-Arabic-Persian edition, Tehran: Ketabsaray-e Tandis, 2002（穆宏燕汉译）。

⑤ Omar Khayyam, *Rubaiyat (Quatrains)*, Persian-English-French-Russian-Arabic-Spanish-Chinese-Japanese edition, Tehran: Gooya House of Culture and Art, 2010（王一丹汉译）。

⑥ 诗人译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湘。他的《番石榴集》大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世界范围内的译诗选本，入选其中的波斯古典诗人有5人，除了阿玛·加漾（即欧玛尔·海亚姆）以外，还榴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31页（15首）；又见《朱湘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的长诗《索赫拉与鲁斯通》实际上也是波斯古典文学故事，出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名的一悲剧。

家，也有笔耕多年的翻译家，以及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可谓“译笔缤纷，华章比美”^①，蔚为大观。甚至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作家金庸也借故事中波斯少女之口，吟咏海亚姆的诗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②译笔之典雅飘逸，令人称绝。

伴随着译本出现的，是不断增多的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对于《鲁拜集》汉译的历史与得失，已有众多研究者进行了回顾与总结^③。在总结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对《鲁拜集》汉译方法的理论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是黄杲忻根据其多年翻译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兼顾译诗诗行顿数、字数与韵式”的翻译法^④，以及邵斌在系统考察各家《鲁拜集》汉译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诗歌创意翻译”概念^⑤。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在《鲁拜集》翻译研究领域，逐渐有研究者立足于波斯语文本和波斯—伊斯兰文化传统，重新审视《鲁拜集》的翻译，起初是张承志、张鸿年等知名学者提出质疑^⑥，后来又有研究者更进一步，尝试采用后殖民理论来观照《鲁拜集》的汉译，他们或分析中国译者在西方视角影响下长期以来对海亚姆形成的误读^⑦，或探讨《鲁拜集》如何经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的折射，被附加上英语文学所处的强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当时中国对波斯文学认知的过程^⑧。这一类文章目前为数不多，但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① 张承志语，见《波斯的礼物》，收入《文明的入门》，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② 金庸：《倚天屠龙记》第30章《东西永隔如参商》，香港明河社1983年第5版，第3册，第1199页。

③ 这方面的著述极为丰富，笔者所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莫渝《〈鲁拜集〉——甲子翻译史》，《台湾时报》1987年3月6日；黄杲忻《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第四章“《鲁拜集》百年汉译研究”，第73—157页。

④ 黄杲忻：《英诗汉译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同作者《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第227页。

⑤ 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第178—185页。

⑥ 张承志：《波斯的礼物》，见《文明的入门》第323—326页；张鸿年：《“啊，我爱”根本不存在——鲁拜翻译漫谈》，《文汇报书周报》2002年5月17日。

⑦ 参见格丽娜尔·吾甫力《译者的误读与误导——以欧玛尔·海亚姆诗歌的翻译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⑧ 参见沈一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世界文学中的运用——以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翻译为例》，见《东方文学研究：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就诗歌本身而言，海亚姆用波斯语创作的《鲁拜集》语言纯净，风格清新，哲理深邃，几乎每一首都堪称波斯语诗歌的精品，令所有懂波斯语的人沉醉。因此，尽管译自英语的《鲁拜集》已如此之多，也不乏成功之作，却仍然不断会有懂得波斯语这门诗歌语言的人愿意倾尽全力将它直接从原文译出，为人们提供更多认识的角度和鉴赏的途径。与《鲁拜集》英—汉翻译 90 多年的历史相比，直接译自波斯语原文的《鲁拜集》汉译时尚短，经验不足，更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难题，而《鲁拜集》英—汉翻译长期积累的经验正如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后来的译者善于从中借鉴经验，汲取营养，那么假以时日，译自波斯语的《鲁拜集》，也同样可以产生令人传诵的佳作。

《鲁拜集》可以说是译成汉语次数最多、最受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波斯文学作品。如果说，胡适当初翻译的那首《希望》，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跨越了千山万水，从西方来到东方，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随着《鲁拜集》各种汉译本问世，这颗种子已经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出了众多缤纷的花朵。回顾这颗种子落地和成长的过程，以及催发它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们仍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感悟。

中国与波斯虽然同处世界的东方，但《鲁拜集》这部波斯文学的名著，却是首先通过远在西欧的英国翻译家、作为英语文学的名著而被介绍到中国，获得人们的喜爱和欣赏。从波斯到英国、再从英国到中国，在辗转跋涉于异文化国度的过程中，《鲁拜集》给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民族，带来了不同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力量。《鲁拜集》翻译过程中这种因时代和民族而异所发生的再创造现象，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者对其文化内涵的取舍。

比较英语文本与波斯语文本《鲁拜集》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的汉译本的不同，将使我们真正理解《鲁拜集》在波斯、英国和中国跨文化语境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过滤、误读、重写等现象，其有趣之处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语言翻译层面和单纯的文学接受范畴，体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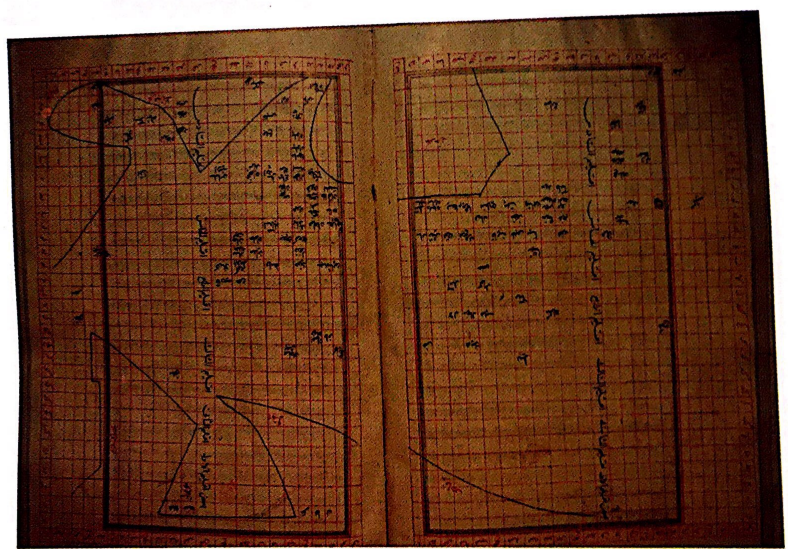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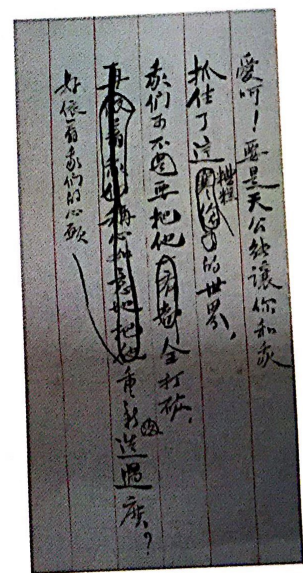
更为复杂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对话的问题。

四、结语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精神需求。正如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精神一样，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也受制于时代的精神与需要。只有符合时代需求、契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作品，才能引起共鸣、打动心灵，才能被翻译作品的读者所广泛接受。如果没有菲兹杰拉德那充满维多利亚时代人文精神的、自由而优美的、富于创造性的翻译，海亚姆作为诗人的面目也许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鲁拜集》仍然只能作为一部深奥的波斯古典文学文本停留在少数几个东方学家的案头，而不会像今天这样走入世界上难以计数的读者的心田，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同样，如果没有胡适和郭沫若那反映了五四精神的汉译，《鲁拜集》不会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也不会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留下如此悠长的回响。事实上，如同菲兹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已经成为英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一样，郭沫若的《鲁拜集》汉译本也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如果说好的诗歌翻译要“特别能培养一种新的感受力，特别能给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①，从这一点来说，菲兹杰拉德做到了，胡适和郭沫若也做到了。

^① 王佐良：《论新开端·序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图1 胡适译古波斯诗人
 莪默《鲁拜集》诗一首
 (摄于“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14周年北大著名学
 者手稿展”，文见《跨越
 东西方的诗歌之旅》)



彩图2 哈姆杜拉·穆斯图菲《心之喜悦》中的地图
 (文见《波斯文献中关于喀什噶尔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的记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仑名师讲坛演讲录,第1辑/杨海萍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750-5

I. ①昆… II. ①杨…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2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昆仑名师讲坛演讲录

(第一辑)

杨海萍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50-5

2013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½

定价: 39.00元